

羅聯添 編輯

中國文學批評資料彙編

——
隋唐五代

國立編譯館

主編

成文出版社

印行

中國文學批評資料彙編之二

羅聯添編輯

隋唐五代文學批評資料彙

國立編譯館主編
成文出版社印行

中國文學批評資料彙編之二

隋唐五代文學批評資料彙編

定價新台幣壹佰零伍圓整

版權所有



翻印必究

主編：國立編譯館

編輯：羅聯添

出版者：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

發行人：黃成助

發行者：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

發行所：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三段一號十二樓

電話：3931641-2, 3410132

郵政劃撥帳號14447號全省通用

印刷者：清水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市中山北路一段七一號

初版：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九月

登記證：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143號

中國文學批評資料彙編

敘例

一、我國有關文學批評之資料，除若干專書外，全屬零星篇章，散見於總集、別集、史傳、類書、隨筆，學者每有觀覽難周之嘆。此類零星篇章爲數至夥，亟需蒐集整理，以利學者研究。本彙編之編撰，宗旨在此。

二、我國文學批評，至漢代始稍具規模。故本彙編所收資料，起自兩漢，止於清末，全屬零星篇章。原已編輯成書之文學批評著作，如文心雕龍、詩品，及諸家詩話、詞話、曲話等，無論是單行本或編入總集別集者，本彙編一概不收。

三、本彙編所收之文學批評資料，包括文體論、創作論、批評論。

四、本彙編由葉慶炳負責策畫並擔任編輯委員會召集人。書分八冊：第一冊兩漢魏晉南北朝，由柯慶明、曾永義編輯。第二冊隋唐五代，由羅聯添編輯。第三冊北宋，由黃啓方編輯。第四冊南宋，由張健編輯。第五冊金代，由林明德編輯。第六冊元代，由曾永義編輯。第七冊明代，由葉慶炳、邵紅編輯。第八冊清代，由吳宏一、葉慶炳編輯。

五、本彙編各冊均分敘論與資料彙編二部分。前者綜論此一時代文學批評之特色、流派及其成就，後者則就所收資料按時代先後排列，不但便於翻檢，且可看出文學批評發展之線索。

六、兩宋以下，由於載籍浩瀚，文學批評資料亦極繁多。本彙編由於篇幅所限，對所收資料不能不加以選擇，但期重要資料，不至遺漏耳。

七、本彙編所收各條資料均加新式標點，注明原書板本卷次。原書文字顯有脫誤者，則加校勘說明。

八、本彙編自籌畫至編撰，深蒙國立編譯館王前館長天民、熊館長先舉、齊主任邦媛、黃編審中之支持鼓勵，謹此誌謝。

中國文學批評資料彙編編輯委員會謹識

民國六十七年九月一日

緒論

羅聯添

隋唐五代文學理論的發展與演變

爲敘述方便，本文將隋唐五代三百七十多年文學理論的發展與演變，分爲四個時期①。第一個時期爲隋至初唐一百多年（隋文帝開皇九年——唐睿宗太極元年，西元五八九——七一二）。在此時期，一般文學作家和史學家在理論上主張詩文復古，抨擊六朝文風，但在創作方面仍未脫離六朝宮體駢儷餘習，是一個文風將變而未變的時期。第二個時期即所謂盛唐時期的五十多年（約自唐玄宗開元元年起至代宗永泰元年止，西元七一三——七六五）。在此時期，詩歌理論方面，一則有李白承襲初唐陳子昂議論，繼續鼓吹復古；再則有杜甫起而折衷，提倡「力親風雅」，而又「不廢齊梁」。在創作上，已逐漸擺脫六朝宮體駢儷的影響，照着「風雅比興」標準從事寫作，是一個文風已經轉變的時期。第三個時期即所謂中唐時期的七十多年（約自代宗大曆元年起至文宗大和九年止，西元七六六——八三五）。在此時期有提倡「文以質道」的韓柳，有主張「詩以載義」的元白。他們以詩文復古爲鵠的，將理論付諸實踐，是文學理論和理論實踐發展到極盛而又將衰的時期。第四個時期是從晚唐到五代一百多年（約自唐文宗開成元年起至五代周恭帝元年止，西元八三六——九六〇）。此期之初，古文由於趨奇走怪，漸爲一般作家所厭棄，於是興起復古潮流，提倡四六；而詩歌由於寫實派作品枯燥乏味，苦吟派作品又雕琢過甚，李商隱、韓偓等遂主張代之以豔麗，這是駢儷宮體的迴流。其後豔麗太過，流於淫靡，黃滔、吳融等復起而反對，提倡寓有教化意義的詩文。有豔麗派與實用的迴流。

派的對立，自必有調和派的出現。降及五代，舊唐書作者遂起而折衷，主張文質並重，古今兼取。但五代淫靡文風已成，作者唯華辭是尚，調和之論並未產生什麼影響。概述既竟，下分四節，再作詳細敘說。

一

初唐李延壽在北史文苑傳序中，指出南北朝文學最大的不同，是南朝文學重辭華，北朝文學重氣質。

隋文帝楊堅統一南北後，在文學方面，是傾心北朝，厭惡南朝的。所以早在開皇四年（五八四）普詔天下，公私文書，要據實記錄。同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以文表華豔，交付有司治罪^②。治書侍御史李諤對南朝華僞文風更予強烈的批評：

古先哲王之化民也，必變其視聽，防其嗜欲，塞其邪放之心，示以淳和之路。五教六行，爲訓民之本；詩書禮易，爲道義之門。故能家復孝慈，人知禮讓，正俗調風，莫大於此。

……然降及後代，風教漸落。魏之三祖，更尚文詞，忽君人之大道，好雕蟲之小藝，下之從上，有同影響，競騁文華，遂成風俗。江左齊梁，其弊彌甚，貴賤賢愚，唯務吟詠，遂復遺理存異，尋虛逐微，競一韻之奇，爭一字之巧。連篇累牘，不出月露之形；積案盈箱，唯是風雲之狀。世俗以此相高，朝廷據茲擢士。祿利之路既開，愛尚之情愈篤。於是閭里童昏，貴遊總角，未窺六甲，先製五言。至如義皇舜禹之典，伊傅周孔之說，不復關心，何嘗入耳。以倣誕爲清虛，以緣情爲勳績；指儒素爲古拙，用詞賦爲君子。故文筆日繁

，其政日亂，良由棄大聖之軌模，構無用爲有用也。……③

李譔認爲「五教六行，爲訓民之本；詩書禮易，爲道義之門。」南朝所以「文筆日繁，其政日亂」，乃由於其時不論貴賤賢愚，唯務吟詠，尋虛逐微，競奇爭巧；所寫內容無非是月露風雲，不復關心儒家大道。李譔，趙郡（在今河北）人，歷仕北齊、北周。（在他之前，西魏時代，已有蘇綽仿尚書作大誥④）北朝文人輕文重質，李譔適可作爲代表。

隋末儒者王通（五八四——六一八）也劇烈反對南朝文風，主張詩文載道⑤。王通論文，認爲文要合理，「言文而不及理，是天下無文也」⑥；論詩，要求「上明三綱，下達五常」，「可以諷，可以達。……出則悌，入則孝。多見治亂之情。」⑦他甚至以文章是否合道作爲君子與小人的區分。以爲古之君子都是先「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」，而後才游於藝⑧。而後世文士所作文章，傲、冶、怪、誕，都是狂狷纖小之人。中說事君篇說：

文士之行可見：謝靈運小人哉，其文傲，君子則謹。沈休文小人哉，其文冶，君子則典。

鮑照、江淹古之狷者也，其文急以怨。吳筠、孔珪古之狂者也，其文怪以怒。謝莊、王融古之纖人也，其文碎。徐陵、庾信古之夸人也，其文誕。

從這一段話，可見王通對南朝文士沈、謝、徐、庾之流極端的不滿。

初唐另一儒者孔穎達，在毛詩正義序表達他對詩經的看法：

夫詩者，論功頌德之歌，止僻防邪之訓，雖無爲而自發，乃有益於生靈，六情靜於中，百物盪於外，情隨物動，物感情遷。若政運醇和，則歡娛被於朝野；時當慘黷，亦怨刺形於

詠歌。作之者，所以暢懷舒憤；聞之者，足以塞違從正。發諸情性，諧於律呂。故曰：「感天地，動鬼神，莫近於詩。」此乃詩之爲用，其利大矣。

毛詩正義和其他四經（易、書、禮、左氏春秋傳）於高宗永徽四年（六五三）頒布天下，此後每年明經進士依此考試，正義本毛詩成爲當時詩學權威，孔穎達此序所謂「詩者，論功頌德之歌，止僻防邪之訓」等語，肯定詩的教化功用，對當代詩壇自有相當影響。

在史學界方面，除房玄齡對六朝文學有相當推崇外^⑨，其餘，如李百藥（五六三——六四八，北齊書）、魏徵（五八〇——六四三，隋書）、姚思廉（？——六三七，梁書、陳書）、令狐德棻（五八三——六六六，周書）、李延壽（五九八？——六七八？南史、北史）莫不反對六朝華麗文風，闡揚宗經尊聖輔佐教化的理論。魏徵羣書治要序云：

近古皇王，時有撰述，並皆包括天地，牢籠羣有，競採浮豔之詞，爭馳迂誕之說，聘末學之博聞，飾雕蟲之小技，流蕩忘反，殊途同致。……

又隋書經籍志集部總論云：

……梁簡文帝在東宮，亦好篇什，清詞巧製，止乎衽席之間；彫琢蔓藻，思極閨闈之內。後生好事，遞相放習，朝野紛紛，號爲宮體，流蕩不已，訖於喪亡。陳氏因之，未能全變。其中原則，兵亂積年，文章道盡。……

又隋書文學傳序云：

梁自大同之後，雅道淪缺，漸乖典則，爭馳新巧。簡文、湘東啓其淫放，徐陵、庾信分路

揚鑣。其意淺而繁，其文匿而彰。詞尙輕險，情多哀思，格以延陵之聽，蓋亦亡國之音乎？

魏徵又批評梁太宗（簡文帝）「文豔用寡，華而不實，體窮淫麗，義罕疏通。」^⑩稱許隋煬帝所作「並存雅體，歸於典制」^⑪，推崇唐高祖能「斷雕爲樸，發號施令，咸去浮華」^⑫。並提出實用的文學觀。文學傳序云：

易曰：「觀乎天文，以察時變；觀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」傳曰：「言，身之文也；言而不文，行之不遠。」故堯曰則天，表文明之稱；周云盛德，著煥乎之美。然則文之爲用大矣哉！上所以敷德教於下，下所以達情志於上，大則經緯天地，作訓垂範；次則風謠歌頌，匡主和民。

這種「經緯天地，作訓垂範」的文學觀，對中唐時代的古文運動當有啓導的作用。

另一史學家姚思廉認爲文之用在「經禮樂而緯國家，通古今而述美惡。」在他所著陳書後主本紀中，更將亂亡之禍，歸於淫麗之文：

古人有言：「亡國之主多有才藝。」考之梁陳及隋，信非虛論。然則不崇教義之本，偏向淫麗之文，徒長澆僞之風，無救亂亡之禍矣^⑬。

此外，令狐德棻在庾信傳論，也表達他對文學的見解：

然則子山之文，發源於宋末，盛行於梁季。其體以淫放爲本，其詞以輕險爲宗。故能誇目侈於紅紫，蕩心逾於鄭衛。昔揚子雲有言：「詩人之賦，麗以則；詞人之賦，麗以淫。」若以庾氏方之，斯又詞賦之罪人也。原夫文章之作，本乎情性。覃思則變化無方，形言則

條流遂廣。雖詩賦與奏議異軫，銘誄與書論殊塗，而掇其指要，舉其大抵，莫若以氣為主，以文傳意^⑭。

令狐德棻謂「文章之作，本乎情性」，雖與實用派主張稍有不同，但觀其論庾信文體淫放輕險，誇目蕩心，斥之爲「詞賦之罪人」，則其反六朝文學的論調和魏徵、姚思廉是一致的。

在文壇方面，初唐四傑之一——王勃，稱「文章爲經國之大業，不朽之能事。……非緣情體物，雕蟲小技而已。」^⑮嘗評論高宗龍朔初年（六六一——六六三）的文壇情況是：「爭構纖微，競爲雕刻。……氣骨都盡，剛健不聞。」^⑯在上吏部裴侍郎啓中，更明白指出文章之道關係國家的盛衰：

夫文章之道，自古稱難，聖人以開物成務，君子以立言見志。……苟非可以甄明大義，矯正末流，俗化資以興衰，家國繇其輕重，古人未嘗留心也。自微言既絕，斯文不振。屈宋導澆源於前，枚馬張淫風於後。談人主者，以宮室苑囿爲雄，叙名流者，以沉酗驕奢爲達。故魏文用之而中國衰，宋武貴之而江東亂。雖沈謝爭驚，適先兆齊梁之危；徐庾並馳，不能免周陳之禍。……潛夫昌言之論，作之而有逆於時；周公孔氏之教，存之而不行於代，天下之文靡不壞矣。^⑰

王勃認爲天下文章之敗壞，是由於周公孔子之教不行於代。這種觀念實已開啓「文以載道」的先河。唯王勃主張如此，然所作仍未脫離六朝駢儷餘習。這一方面固由於積重難返，另一方面也是文風將變未變時期必然現象。

四傑另一作家盧照鄰則從聲律方面抨擊四聲八病的煩苛。其南陽公集序云：

……八病爰起，沈隱侯永作拘囚；四聲未分，梁武帝長爲孽俗。後生莫曉，更恨文律繁苛；知音者稀，常恐詞林交喪。雅頌不作，則後死者焉得而聞乎？^⑮

但他和盧照鄰一樣未能擺脫六朝駢儷文的影響。

四傑之後，明白揭出復古理論並加以實踐的，是陳子昂（六五六——六九五）。其修竹篇序云：

文章道弊五百年矣！漢魏風骨，晉宋莫傳，然而文獻有可徵者。僕嘗暇時觀齊梁間詩，彩麗競繁，而興寄都絕，每以永歎。竊思古人，常恐逶迤頹靡，風雅不作，以耿耿也。……

⑮

他反對齊梁詩歌「彩麗競繁，而興寄都絕。」主張恢復詩經風雅和漢魏風骨。盧藏用（六六四——七二三）作陳子昂別傳讚揚他：「善屬文，雅有相如、子雲之風骨。」^⑯又作陳子昂文集序謂：「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。……卓立千古，橫制頹波，天下翕然，質文一變。」^⑰可見陳子昂在初唐末期是扭轉文壇風氣的主要人物。

二

文學理論發展到盛唐時期，有元兢主張文以「情緒爲先」「綺錯爲末」^⑱；有張說認爲文之用在「吟咏情性，紀述事業，潤色王道，發揮聖門。」^⑲他們都承接初唐文學思想繼續反對六朝文風。李白（七〇一——七六二）更直承陳子昂主張，反對綺麗，提倡風雅與清真。其古風第一首云：

大雅久不作，吾衰竟誰陳。……正聲何微茫，哀怨起騷人。揚馬激頽波，開流蕩無垠。廢興雖萬變，憲章亦已淪。自從建安來，綺麗不足珍。聖代復元古，垂衣貴清真。……我志在刪述，垂輝運千春，希聖如有立，絕筆於獲麟。^②

李白「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」詩云：「蓬萊文章建安骨，中間小謝又清發。」^③又「送儲邕之武昌」詩云：「諾謂楚人重，詩傳謝朓清。」^④又「金陵城西樓月下吟」云：「解道澄江靜如練，令人長憶謝玄暉。」^⑤可知李白雖不滿六朝詩綺麗，但於謝朓詩的清麗、清新則予以推重。此外，在詩體方面，李白倡古風，輕視律詩，唐孟榮「本事詩」「高逸第三」載李白論詩之語云：

梁陳以來，豔薄斯極，沈休文又尚以聲律，將復古道，非我而誰與？……與寄深微，五言不如四言，七言又其靡也，況使束於聲調俳優哉？

李白認為五七言律體要受格律的拘束，不容易「與寄深微」。所以復古道非用古風體裁不可。其次，在寫作方面，重視自然流露。古風第三十五首云：

醜女來效顰，還家驚四鄰，壽陵失本步，笑殺邯鄲人，一曲斐然子，雕蟲喪天真。……大雅思文王，頌聲久崩淪，安得郢中質，一揮成風斤。

又「贈江夏韋太守良宰」詩云：

覽君荆山作，江鮑堪動色，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飾。……^⑥

再次，值得注意的，是李白的寫作態度。李白族叔李陽冰「翰林李太白集序」稱李白：

不讀非聖之書，恥為鄭衛之作。……凡所著述，言多諷興。自三代以來，風騷之後，馳驅

屈宋，鞭撻揚馬，千載獨步，唯公一人。……盧黃門云：「陳拾遺橫制頽波，天下質文，翦然一變。」至今朝詩體尚有梁陳宮掖之風，至公大變，掃地併盡。今古文集遇而不行，

唯公文章，橫被六合，可謂力敵造化歟！

李白著述多諷興（或以李白諷興詩不多，然李白著述十喪其九，不宜據今傳李白詩爲論），掃盡梁陳宮掖之風。文學理論發展至此，已不再是空談，作家能够自我反省，將理論付之於實踐，是一個文風真正轉變的時期。

與李白約略同時的杜甫（七一二——七七〇），在寫作方面是承先啓後的大家，但在詩歌理論方面亦有許多重要的觀念，影響於當代與後世。茲歸納下列幾個要點說明：

第一，親風雅，重比興。「戲爲六絕句」其六云：「別裁僞體親風雅，轉益多師是汝師」②。又「同元使君春陵行」序云：「覽道州元使君結春陵行、兼賊退後示官吏作二首，……不意復見比興體制。」詩云：「……兩章對秋月，一字借華星，致君唐虞際，純朴憶大庭。……」③元結是提倡詩文復古的作家。杜甫讀其春陵行、賊退篇，認爲具有「比興體制」，具有「致君唐虞際」的功用，可知杜甫論詩相當重視風雅比興。中唐時代白居易論詩有所謂「詩歌合爲事而作」之語，杜甫實已發其先聲。

第二，不薄今人愛古人。稱許今人的，如稱李白云：「李侯有佳句，往往似陰鏗。」④「筆落驚風雨，詩成泣鬼神。」⑤「白也詩無敵，飄然思不羣。清新庾開府，俊逸鮑參軍。」⑥稱嚴武云：「詩清立意新。」⑦稱孟浩然云：「清詩句句盡堪傳」⑧，又云：「吾憐孟浩然，短褐卽長夜，賦詩何必多，往往凌鮑謝」⑨。稱王維云：「最傳秀句實區滿」⑩。稱薛據云：「賦詩賓客間，揮灑動八垓，乃知蓋代手，才力老益」⑪。

神」^③。稱四傑云：「王楊盧駱當時體，……不廢江河萬古流」^④。推重古人的，如稱宋玉云：「風流儒雅亦吾師」^⑤，稱曹植云：「文章波瀾闊」^⑥，稱庾信云：「凌雲健筆意縱橫」^⑦，稱陰鏗何遜云：「苦用心」、「尚清省」^⑧。蓋杜甫認為每個時代都有其文學主流與特色，厚古薄今，或以今議古，皆非所宜，故主張博采古今，多方師承，融會貫通，以成一家。這種文學觀念與創作態度，對當代與後世詩人自有啓導作用。

第三，不反對齊梁的綺麗。偶題詩云：「前輩飛騰入，餘波綺麗爲，後賢兼舊利，歷代各清規。」^⑨認為前輩作風趨於綺麗，是文學演進自然趨勢^⑩，後世承流接響，能够「轉益多師」，不當鄙棄。所以主張「清詞麗句必爲鄰」，並讚揚「綺麗玄暉擁」^⑪。此與李白所謂「綺麗不足珍」的論調大不相同。

第四，注重格律。李白倡古風，輕格律，故少作律詩。杜甫則極注重格律，寫作亦惟格律是求，因有律聖之稱。不僅律體如此，古風亦復如此。元稹「杜君墓係銘」序云：「鋪陳終始，排比聲韻，大或千言，次猶數百，辭氣豪邁，而風調清深，屬對律切，而脫棄凡近。」^⑫又白居易「與元九書」云：「杜詩最多，可傳者千餘首。至於貫穿古今，覩縷格律，盡工盡善，又過於李焉。」^⑬元白對杜甫格律詩的讚揚，足以說明杜甫寫作不論古體、近體是以格律爲重的。杜甫自己也說到，所謂「覓句新知律」^⑭、「晚節漸於詩律細」^⑮，以及稱許時人「遺詞必中律」^⑯、「思動雲物外，律中鬼神驚。」^⑰在在足以證明杜甫對詩格律的講究和重視。

第五，注重雕琢。杜甫認爲文章經過苦心雕琢，方能流傳不朽。「新詩改罷自長吟」^⑱，「爲人性僻耽佳句，語不驚人死不休」^⑲。這些都是他作詩苦心雕琢的自述。而這種苦用心的寫作方式，杜甫自認是學自南朝齊梁時的陰鏗、何遜。中唐時代的賈島及其以後若干詩人，爲詩重苦吟，當是受杜甫的影響。

盛唐時代承襲初唐王通等人的詩文載道觀念，而加以發揚的，有古文家蕭穎士、李華、元結等。蕭穎士（七三五年進士）自稱「平生屬文，格不近俗，凡所擬議，必希古人。魏晉以來，未嘗留意。」又云：「有識以來，寡於嗜好，經術之外，略不嬰心。」⁵⁵可知他是一個存心經術，志在復古的人物。又云：「丈夫生遇昇平時，……尙應優遊道術，以名教爲己任，著一家之言，垂沮勸之益。」⁵⁶則明白揭示君子應以名教爲己任，著書立說應寓有勸戒的功能。穎士弟子李華（七三五年進士），承受師傳，推崇六經，薄棄屈宋以後文章⁵⁷。主張「文敝，則復之以質」⁵⁸，自己所作「必本乎王道」，「以五經爲泉源」⁵⁹。另一古文家元結（七一九——七七二）自稱所爲之文「可戒、可勸、可安、可順。」「意必勸之忠孝，誘以仁惠，急於公直，守於節分。」爲「救世勸俗」之所須⁶⁰。元結議論雖不多，但他所作古文剪除六朝駢儷，已爲中唐古文運動鋪下坦途。

此外在肅宗時代（七五六——七六二）有二個文名不著，而在文學理論上頗值得注意的人物。其一是劉曉。他主張取士以德行爲先，才藝爲末。上肅宗皇帝疏云：

……夫德行者可以化人成俗，才藝者可以約法立名。致有朝登科甲而陷刑辟，制法守度使之然也。陛下焉得不改而張之。至如日誦萬言，何關理體；文成七步，未足化人。昔子張學干祿，仲尼曰：「言寡尤，行寡悔，祿在其中矣。」又曰：「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。」今舍其本而循其末。況古之作文，比諧風雅；今之末學，不近典謨。勞心於草木之間，極筆於烟雲之際，以此成俗，斯大謬也。昔之採詩以觀風俗：詠卷耳，則忠臣喜；誦蓼莪，而孝子悲。溫柔敦厚，詩教也，豈主於淫文哉？夫人之愛名如水之就下，上有所爲，下必

甚焉。陛下若以德行為先，才藝為末，必敦德勵行，以佇甲科。……①

唐中宗時代，進士考試加試雜文②，——一詩一賦。自是士子「驅馳於才藝，不務於德行」，「不近典謨，勞心於草木之間，極筆於烟雲之際。」要扭轉這種風氣，必須提倡溫柔敦厚的詩教。劉曉這種議論雖未為朝廷接受，但對當時科試取士只重才藝不重德行的風氣，是一個鍼砭。

另一儒者尚衡將作家分為三等。君子之文為上等，而詞士之文列為下等。其文道元龜云：

文章之閭，大抵不出乎三等。……君子之文為上等，其德全；志士之文為中等，其義全；詞士之文為下等，其思全。……君子之作先乎行，行為之質；後乎言，言為之文；行不出乎言，言不出乎行，質文相半，斯乃化成之道。……詞士之作，學古以據情，屬詞以及物，及物勝則詞麗，據情逸則氣高。高者求清，麗者求婉。耻乎質，貴乎情，而忘其志，斯乃頹靡之道焉。古人之貴有文者，將以飭行、表德、見情、著事，杼軸乎天人之際，道達乎性命之元，正復乎君臣之位，昭感乎鬼神之奧。苟失其道，無所措矣。③

文之貴在飭行、表德、見情、著事，故君子「文成而業著」。而詞士之文「恥乎質，貴乎情，而忘其志」，「以斯文而欲軌物範衆，經邦敘政，其難乎化成！」尚衡所論與蕭、李、元結見解可謂大同小異，對中唐時代「文以貫道」理論的建立，當有引發之功。

三